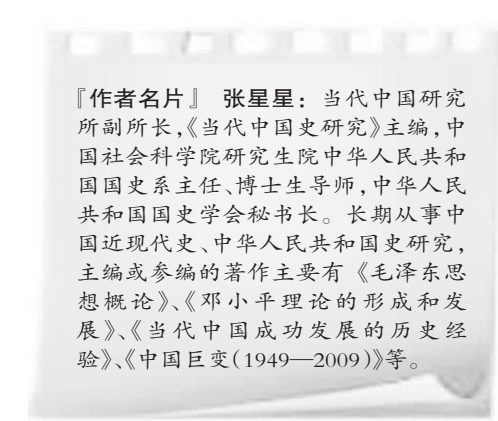


忠实记写新中国的光辉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张星星

走向繁荣 哲学社会科学60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有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做过初步尝试。195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应“及时收集和保存建国史料”,并“加以整理”。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后,河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师生编写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写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与天津部分高等院校教师编写和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讲授提纲(初稿)》。但是,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这些著述带有明显的“大跃进”痕迹,被当作“历史创作的卫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对新中国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逐渐引起党和国家以及学术界的关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科学总结,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1983年,在全国范围有组织地启动了反映新中国各领域、各行业、各地区历史的系列丛书《当代中国》的编纂工作,为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和研究基础。经过各方面学者的艰辛探索与开拓创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取得了众多学术成果,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一个最年轻的学科。

主要成就

编辑出版档案文献,奠定扎实的史料基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和“三中全会以来”至“十七大以来”等重要文献选编,系统收录了党和国家的重要历史文献;国家机构和政府机关编辑出版了《人民代表大会文献选编》、《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等领域性或行业性历史文献;国家和政府有关部门编辑出版了《民族工作文献选编》、《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等专题性历史文献。中央还系统编辑出版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江泽民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文选、文稿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各级档案管理部门也在历史档案的开放与利用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

加强学术研究和创新,形成系统的学科体系。历时15年、动员全国10万人共同编写完成的《当

代中国》丛书,共出版152卷、211册,是全面反映新中国发展历程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由学者编著的单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已先后出版数十种。按领域或门类研究的专门史著作、按历史阶段研究的专题史著作和集中研究重大历史事件的专题研究著作,已涵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以及各个历史时期和主要历史事件。各种类型的工具书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等。

设立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发展和壮大学科队伍。1990年,中央批准成立了专门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研究和出版的当代中国研究所。1991年,成立了以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为主要任务的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创办了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业期刊《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高等院校也先后设立了主要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学术机构或研究中心。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推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共同发展。进入新时期以来,各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通用教材。2006年,全国高等院校普遍设立了一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促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内容进入高等院校共同课教学。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依托当代中国研究所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系,先后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于2004年自主设立了当代中国史专业,其他许多高等院校也在相关学科下陆续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方向。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培养了大批新生力量。

热点探析

关于学科定位。多数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属于中国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是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的延续,是中国通史的现代或当代部分。但是,由于国家颁布的学科目录中并没有单独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因而在对学科定位的认识上还存在一些分歧。有的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当代中国史有明显的区别,它以政治为主线,而当代中国史的研究范围较为宽广。这种观点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具体国家形态,抽象地谈论当代中国史,显然是不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不仅应当研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历史,同时也必须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所发生的历史变化。

关于研究主线。一种观点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应当着重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开创和发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主线;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主线不是也不应当是由单一要素构成,而应当包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等多种要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主线的不同认识,实际上涉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对象和范围的认识差异。从狭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主要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的建立和发展的历史;从广义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应该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历史变迁。只有从广义上来认识,才能正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对象、范围和主线。

关于历史主流。新中国的历史波澜壮阔,只有抓住本质和主流,才能从宏观上和整体上正确把握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总体评价。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确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探索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使社会主义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壮丽的篇章。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流,就应当着力于对历史成就和成功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关于正确认识失误和曲折。任何历史都不是也不可能直线前进的。新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的确曾发生过失误和曲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如何正确研究历史上的失误和曲折,成为一个关键和难点。多数学者认为,应当把历史上的失误放在当时的背景下,科学地分析导致失误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应当全面认识历史上的成就和失误,而不应以偏概全、以错误的态度抹黑或丑化历史;应当着重于总结失误的教训,为今天的实践提供有益的鉴戒,使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成为推动当代中国继续发展的宝贵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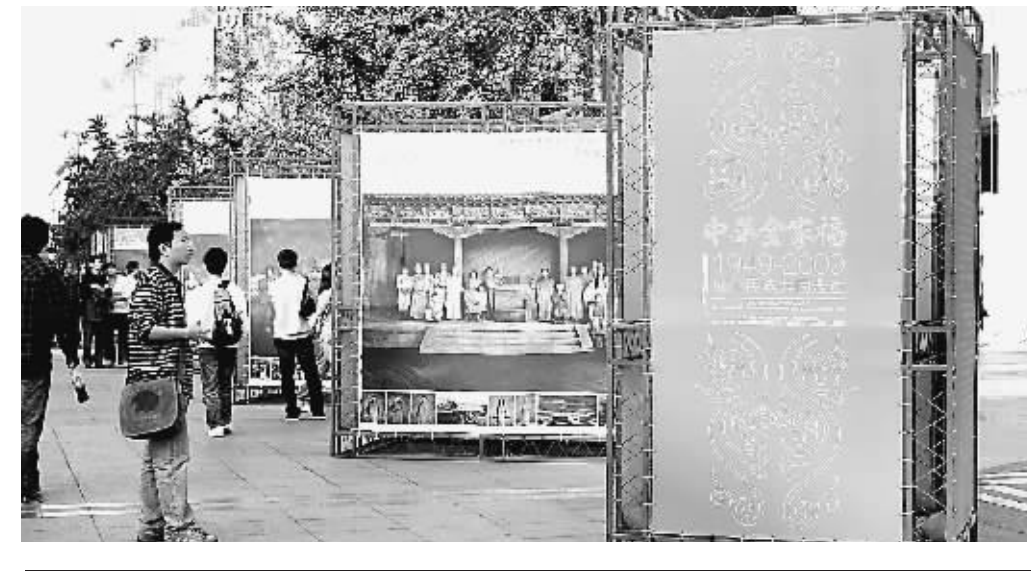
思考与展望

明确学科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但是,目前在国家的学科目录中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就影响和制约了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中华民族历史中划时代的新篇章。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中国历史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无法充分展现中华民族全部的历史辉煌。应当正式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科定位,以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独立发展,为繁荣中国历史科学作出积极贡献。

推进学科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一门年轻的历史学科,在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学科体系和学科史等基础建设方面尚有不够完备、不够成熟之处,一些学科重大问题还缺乏系统的科学阐释和一致的认识。数量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既有建立在扎实研究基础上的力作,也有不少公式化、概念化、低水平重复的应时之作。应当认真学习和弘扬中国历史学的优秀传统,广泛借鉴各相关学科的有益经验,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科建设,为其发展和繁荣奠定更加坚实的学科基础。

拓宽研究视野。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存在着过多地集中于政治史、偏重于国家重大决策的倾向,法制史、科技史、文化史、教育史、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全面发展,也影响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轮廓的整体描述。应当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特别是加强对社会生活领域的研究,将丰富多彩的历史片断整合成全面系统的历史记述,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向“通史”方向转化,以更加全面、更加生动、更加多姿多彩地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图景。

挖掘档案文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方面,既存在档案文献开放不够的问题,同时也存在已经出版或公开的档案文献未得到充分利用的问题。缺乏新档案、新史料的支撑,成为一些研究成果陷入低水平重复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已有学者利用中央部委或地方档案撰写出一些较有分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著,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应当进一步加大对档案文献的挖掘力度,特别要充分研究和利用已经开放或公开的档案文献,以更加全面、更加细致、更加严谨的实证研究,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展和创新。



近日,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型摄影展览《中华全家福1949—2009:56个民族共同走过》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举行。

学术

人民网people
www.people.com.cn

本版更多精彩 尽在人民网理论频道
电子信箱:yefan@peopledaily.com.cn

“区域文化与区域发展高层论坛”认为

发展文化产业要有高度的自觉

本报记者 朱佩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区域文化与区域发展高层论坛”近日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与会者围绕区域文化多样性与区域文化互动、区域文化资源开发与区域文化产业发展、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结合形式与实现路径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指出,当今世界,文化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我国的文化产业是最具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之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文化市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着力点。长期以来,受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形成了为数众多、特色鲜明的区域文化,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资源优势。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为各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各地区应积极探索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结合形式和实现路径,充分发挥文化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与会者认为,从当今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实

际来看,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未必就会自动成为文化产业发达的地区,而文化资源贫乏的地区则完全可以凭借市场条件和创意优势成为文化产业发达的地区。因此,在利用区域文化推动区域发展方面,我们必须要有高度的自觉,善于利用市场条件,善于进行文化创意,真正把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其中,尤其要注意推进文化创新。创新是文化发展的生命力所在。不创新,文化就难以传承发展,文化资源就难以“活化”。目前,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大规模复制和传播的能力相对过剩,而原创比较缺乏。因此,加强以原创为核心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今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学术交流



我们告别20世纪还不足10年。当代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曾有过在那个世纪或长或短的生活经历,都是那个世纪走过来的。但是,百年岁月是如此漫长,历史内容是如此丰富,社会变革是如此急剧,以致仅凭个人的切身体验,要深刻了解20世纪历史发展的全貌,实在是难乎其难。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

金冲及同志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根据大量历史资料,写成《20世纪中国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史纲》)一书,把20世纪作为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来考察和研究,告诉我们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线索,特别是中华民族怎样从深重苦难中重新站立起来、又怎样大步走向复兴的基本历程。这就我们对离现实最近的这一个世纪的历史作出深入理解和科学认识提供了重要帮助。如果要我用最简明的语言来形容这部书的长处和优点,就是两个字:真实。这是一部真实再现中国百年巨变的信史。

历史场景的鲜活复原

要保证历史的真实性,首先必须依据可靠的历史资料,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研究,既不能主观臆造,也不能随意曲解。在这方面,《史纲》的态度是十分严谨的。该书所有的历史叙述,都以经过仔细辨析、严格考证的资料为根据。书中引用的资料极为丰富,特别是大量引用了过去尚未公开发表过的珍贵资料。这不仅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可信度,也极大地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

社会现象是十分复杂的。如果只是胡乱抽出一个别事实、罗列一般例子,不仅不能反映历史真相,有时还会起完全相反的作用。所以,列宁强调,必须“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史纲》注重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努力探求历史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这就大大提高了在揭示历史真相方面的深度。

客观历史又是丰富多彩的。史学著作在描述历史时,如果不是从历史实际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仅仅依靠一些范畴和定义来编织历史,抽去了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具体情节,历史就会变得枯燥乏味、晦涩难懂。《史纲》在纠正这种弊端方面,作了可贵的努力和尝试。对于譬如中国共产党怎样从幼稚一步步走向成熟等一些重大问题,《史纲》不依靠繁琐的概念堆砌、简单的逻辑推演,作抽象的空洞说教,而是通过对一件件历史事实的描绘,为读者勾画出一条清晰的演变线索。



该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成果之一,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

1988年冯尔康编著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整理了1911年—1986年6月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成果。《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在此基础上,继续整理了



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讲学的内容总结,包括讲演、答问、研讨和参阅四部分,内容涉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和其他一些重要人物,以及粉碎“四人帮”、1975年整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

努力让国外学者更好地了解当代中国的真实历史,消除一些歧见,是作者讲学的目的,也是该书的主要特色。对于哈佛学者提出的许多问题,比如《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因何而写、1975

历史现象的理性评析

汉代史学家班固在谈到什么样的史学著作可以称得上是“实录”即真实的记录时,提出了两个条件。其一是叙事要质朴、确切,即所谓“其文直,其事核”;其二是评论要客观、公允,即所谓“不虚美,不隐恶”。如果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褒贬失当、好恶任意,即使讲的确有其事,也会远离历史的真实。《史纲》在这个方面做得怎样呢?

简单化是史学研究的大敌,因为历史现象是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历史事件的成败得失,往往存在多重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表现和影响,在两种对立的不同质的事物之间也常常有着多种中间的层次。任何简单化的做法都不能充分反映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史纲》对此给予了足够的注意。比如,在谈到孙中山思想的发展时,指出:“一个人的思想常常不是直线发展的,需要经过某些迂回和曲折,一种新的社会思想的产生,尤其是这样。”这样一种对待历史的辩证态度,贯穿在全书的各个方面。

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本质,才能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不受某些假象的欺骗。比如,对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有人认为国会有了,约法有了,“责任内阁”也有了,西方国家那一套政治体制已经移植了过来,中国已经向民主政治跨进了一大步。其实,那些被称作民意代表的国会议员们,只不过是被军阀们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工具,同民主政治实是在风马牛不相及。正如《史纲》所说:“那些说起来很动听的东西,在西方国家也许取得过一些成效,如果不顾中国国情,硬搬到中国社会中来,却全然变样。”

历史规律的深刻揭示

回顾既往,不是为了怀旧,不是由于伤逝,更不是迷恋于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从历史中获取智慧、汲取力量,以便深刻地了解现在,正确地走向未来。因此,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不但要真实地描述历史、客观地评析历史,而且要努力去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所谓规律,实际是指历史现象中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种主导趋势。《史纲》的最后一章着重讨论了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几个特别引人注目、特别发人深省的问题,这就抓住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本质特征,有助于人们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逐步掌握其规律。

比如,《史纲》强调,“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领导力量,是20世纪中国历史客观进程的结果。”事实证明,在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集中了那么多的先进分子,组织得那么严密和广泛,为中华民族作出了那么多牺牲,同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前进中善于总结经验、郑重对待自己的失误,以形成并坚持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正因为这些原因,才使得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就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当我们在新的世纪,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踏上新的伟大征程时,重温刚刚过去不久的20世纪的峥嵘岁月,将会得到许多深刻而有益的历史启示。这也是《史纲》在今天出版的意义所在。

全面反映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成果

——《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简评

南 严

常建华等编著的《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一书,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8年冯尔康编著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整理了1911年—1986年6月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成果。《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在此基础上,继续整理了

1986年7月—2000年12月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综述”,由社会史理论述评、先秦秦汉社会史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社会史研究、宋辽西夏金元明清社会史研究、近代社会史研究五个部分组成。下编为“中国社会史论文、著作索引”,其中论文索引既有断代性论文索引,又有通论性论文索引,还收录了部分中国香港、台湾、澳门地区的相关论文和专著。此外,为了充分反映近年来社会史研究的新进展,该书介绍了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新领域如生态环境史、疾病医疗史等方面的研究情况。

让国外学者更好地了解当代中国

——《与哈佛学者对话当代中国史》简评

叶维凯

程中原撰著的《与哈佛学者对话当代中国史》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作者依据自己的研究作了深入回答,并努力澄清一些误解。全书观点鲜明、史料丰富、语言生动、议论纵横,有助于读者加深对当代中国史的认识和理解。

新书评介